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五十八期
2003 年 5 月　　頁 71～94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因「亂」而致的心理創傷：
漢族士人對蒙古入侵回應之研究

田　浩 *

摘　要

心理創傷是一種混亂的心靈或行為狀況，主要是因為精神或情感壓力，甚至是本體遭受傷害所致。當一個突然的大災難擊垮人們時，他們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反應，包括恐慌及逃跑，猛烈及暴莽的攻擊，而當無法逃離與不能採取攻擊時，還會有人發生暫時的癱瘓症狀。我對心理創傷的研究集中於蒙古入侵事件，因為它是很特殊的心理創傷混亂經驗。在探討中國的案例時，必須著眼在超乎尋常的心理創傷經驗表達上，就如同余英時教授所談到的，在道學家和儒家傳統文化的抑制下，不允許個人表達出悲傷的情感和回憶私人的心理創傷。因此，心理創傷的聲音通常就變小了，充其量隱秘地轉移到詩當中，用隱喻的語言來表達。因此在閱讀元好問，文天祥及鄭思肖的詩時，會發現這些作品不只在表達心理的傷痛，也是一個處理痛苦情緒的方式。因為中國傳統的詩是一種強調規則與條理化的語言，如果要將心理創傷寫成詩，不僅必須熟悉音律、聲韻，還得清楚覺知到內心深處中，導致混亂的原因，以及無意義的廻圈。除了這些有名的詩人外，其他經歷蒙古佔領的生還者，終究克服他們的心理創傷，透過文學的表達找到生存的目的，並且致力於維護中國文化傳統上。

關鍵詞：創傷，自殺，忠，蒙古佔領，詩，元好問，文天祥，鄭思肖

本文 92.3.26 收稿；92.4.9 通過刊登。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xperiencing Disorder as Trauma: Research on Responses to the Mongol Invasion

Hoyt Cleveland Tillman *

Abstract

Trauma is "the disordered psychic or behavioral state resulting from mental or emotion stress or physical injury." When a sudden catastrophe overwhelms people, they may react in various ways, including panic and flight, violent and reckless assaults, or temporary paralysis when fleeing and attacking are both impossible. My case study of trauma focuses on the Mongol invasion because it was an exceptionally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disorder. Looking at an extraordinarily traumatic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in the Chinese case because, as Professor Yu Yingshi has remarked, Daoist and Confucian strai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iscourage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personal sorrow and the remembering of personal traumas; therefore, voices of trauma were usually muted or, at best, cryptically conveyed in poetry and metaphorical language. Reading Yuan Haowen, Wen Tianxiang, and Zheng Sixiao, I explore how their poetry not only conveyed trauma but also provided a means to process their emotional anguish. Becaus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is written in highly measured and regulated language, re-composing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to poetry required disciplined mastery and brought order and sense to what was chaotic and senseless. In addition to these famous poets, many other survivors of the Mongol conquest appear to have overcome their trauma and found purpose in life through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commitment to preserve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eywords: trauma, suicide, loyalty, Mongol conquest, poetry, Yuan Haowen, Wen Tianxiang, Zheng Sixiao

因「亂」而致的心理創傷：漢族士人對蒙古入侵回應之研究*

田　浩

雖然社會政治與軍事的動蕩通常使處於其中的人們感到極度不安，但週期性的暴力叛亂和戰亂，卻對中國產生了特別強大的影響，並時常造成心理創傷。除去戰場上荼毒生靈的暴力之外，對於中國的士人及眾多百姓來說，社會政治的動蕩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方向迷失（cultural disorientation）。而且，亂還使社會風俗與士人品格陷入危險，誠如朱熹（1130-1200）所嘆：「世亂俗薄，士無常守」。[1] 創傷指「由於精神、情感上的緊張或肉體受傷，導致混亂的心理與行爲狀態。」[2] 當災難突然壓頂而來，人們會有不同的反應：或恐慌或逃逸，或進行無目的的暴力侵擾，或暫時性麻痺意志與身體。而在逃亡與進取都無法實現時，人們便特別容易產生創傷性的焦慮。那些陷於戰爭及自然災害創傷的人，其精神病症有時體現在其行爲之上。[3] 思想與行爲上的精神負擔會衍生出「後—創傷的緊張性混亂」（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致病之

* A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grant, "Culture and Contested Boundaries: Inter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China," has enhanced my research and writing on the Song, Jin and Yuan.

1 朱熹之語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轉引自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頁 13。參見么書儀有關亂對文人的影響的討論，頁 13-25。對民族主義背景下傳統觀點的最新討論見王德毅教授的退休講演：〈晚宋士大夫的氣節〉（國立台灣大學，1999 年 6 月 21 日）。

2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Webster, Inc., 1993）, 1257.

3 Harry Trosman, "Neuroses, " and Norman Alexander Cameron, " Psychology, Abnormal,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2）, 16:295; and 18:7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pathogenic secret）；換句話說，被壓抑的、無意識的記憶仍會繼續撕裂生活、導致苦痛。[4] 的確，西方人一般認爲，那些不願意談論創傷經歷的人最可能遭受後創傷的緊張性混亂，並漩回可怖的過去；然而，東亞人傳統上把不幸藏在心中，避免討論個人的創傷。隨著 911 紐約攻擊事件之後，心理學家迅速投入救助工作，跟受難者對談內心的傷痛。然而，有部分專家發現，與受難者對談受難心理反而會加深心理的創傷，因此若干專家認爲，壓抑創傷記憶的人，反而比較少爲創傷後的併發症所苦。據此，911 經驗可以爲傳統中國處理創傷的方式，提供一些間接的支持論點。[5] 我對中國心理創傷的個案研究著重於十三世紀的蒙古入侵，這是因爲它是一次有關因「亂」而致創傷的極具代表性經驗。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與儒家，都反對以情感抒發個人的不幸，也勸阻人們回憶創傷經歷，人們因而對創傷保持沉默，頂多以詩歌及隱喻性語言含蓄地傳達，[6] 所以在研究中國的心理創傷時，看一看這樣一次特別的創傷經驗是必要的。聆聽那些孤立而斷續的聲音，會告訴我們傳統的中國人是如何遭受痛苦打擊，如何吞咽悲傷，最終又如何可能超越創傷。

蒙古入侵之所以特別具有創傷性，是因爲它偏離或超出了東亞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傳統模式。起初，蒙古人顯然想遵循中亞草原的習慣，威嚇中國人向他們進貢，以取得游牧民族在艱苦的北方草原上貧乏生活所需的食物及其它物品。的確，中國的統治者曾採用「和親」、「歲幣」、「互市」等政策。換句話說，中國可以通過定期向強大的草原部落輸送物品而與他們疏通關係，從而避免大規模防禦及在中亞邊境甚至腹地持久戰爭的消耗。然而，蒙古與金人之間一系列的血腥戰爭，自 1211 年於長城內的畢北邊境上展開，蒙古前後共擊敗了四十萬強大的女真軍隊。這樣的流血戰爭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在 1279 年達到高潮，曾在一天之內，有超過十萬人喪生於畢南的沿海地區。除去蒙古入侵幾乎橫跨整個世紀並踐踏了中國每個地區這些事實之外，死傷的程度是非常突出的，因爲開始時蒙古人只滿足於強佔想要得到的東西，然後就離開，一直到下一次再回來搜括更多的戰利品。所以那些財富爲蒙古人所強奪的農民，他

4 Allen Young, "Suffering and the Origins of Traumatic Memory, " *Daedalus* 125.1 （Winter 1996）: 246-47.

5 See Lauren Slater, "Repress Yourself, "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

6 余英時先生得出這樣的看法，Vera Schwarcz 在 "Public Uses of Personal Grief in Modern China, " *Daedalus* 125.1 （Winter 1996）: 122, 145 n.10 中傳達了余先生的思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的生命和生產一點也引不起蒙古人的注意。在開始的幾十年間，蒙古人基本上未顯示直接統治農業帝國的興趣，他們甚至直到 1260 年宣布建立元朝，才確定以中原爲統治的重心。因此，習慣上對屠殺平民、破壞經濟的約束，對入侵中原的蒙古人並不適用。結果造成了中原人口銳減：1195 年的統計材料聲稱大約有五千萬人口，而在 1235-6 年的統計數字只有約八百五十萬，人口剩下爲蒙古入侵前的 17% 左右。而且，蒙古人因爲注意到自己比中原人口少得多，容易遭受攻擊，所以經常採用屠城之類的恐怖政策，使反對者歸順。[7]

以下幾個鮮明的例子，適足以說明中國許多地區生靈受到荼毒之慘烈。雖然金人的中都（在今北京內）在 1215 年已經降於蒙古軍隊，但其它地區繼續的抵抗激怒了蒙古人，他們燒掉中都的絕大部份，並殺害大批平民。一份記載提到，當時腐爛的肢體覆蓋了路面，屍體中的脂肪使土地都變得油潤。[8] 當南都汴梁（開封）於 1233 年投降時，女真皇室所有男子一日之內全部被砍頭，次日全部女子被當作奴隸押解到北方。[9] 許多年後，這時已有不少城池被毀，忽必烈（元世祖，1260-94 年在位）才下令禁止濫殺；即使如此，謀士姚樞（1203-1280）還在 1275 年的一封信中警告說，蒙古軍隊燒殺劫掠激起南宋的頑強抵抗，從而使征服南宋的進程變得遲緩：

> 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10]（重點線為作者所加）

沒有證據表明忽必烈再一次頒佈命令反對濫殺。而且，在蒙古首領好用恐怖殺戮作爲一種策略的情況下，即便重新頒佈命令也未必有用。在一個月內，圍困

7 見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especially 197-206. 關於史無前例的人口銳減的更多討論，見 Frederick W. Mote, "Chinese Society under Mongol Rule,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n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18-22。關於對蒙古入侵及統治比較正面的討論，特別見 Thomas Allsen, "The Rise of Mongolian Empire and Mongolian Rule in North China," and Morris Rossabi, "The Reign of Khubilai Kahn," 同上。

8 引在 Barfield，201。

9 劉祁：《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本），卷 7，頁 68-69。

10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本），卷 158，頁 371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潭洲（長沙）的蒙古兵威脅城內居民說，如果他們繼續抵抗，將會遭到血腥的大屠殺，在此期間，已有許多人喪失了性命。[11] 蒙古軍隊以傷亡慘重的代價攻佔鎮江城，據說此次戰役中也是屍塞江流。[12] 另外在圍困常州的戰役中，雙方皆有重大傷亡，蒙古將領伯顏（1237-1295）令諸掾吏書諭文射入城中，文中曰：

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13]

經過猛烈攻襲，常州城終致陷落，伯顏下令在城內進行大屠殺，據稱僅有四百個婦女兒童活了下來。

漢人對這種野蠻行徑的一些反應，暗示了心理創傷的存在。首先，蒙古人的恐怖戰術到最後達到了戰略目的。如，蒙古軍隊在常州城內的報復和野蠻殺戮獲得了預期結果，南宋軍隊放棄了蒙古入侵途中的下一個文化中心——蘇州。當蒙古兵收緊圍住南宋京城臨安的繩套時，宋朝的軍隊，包括海軍，差不多都向南逃竄了。在蒙古入侵的最後五年中，南宋的將領和政治領導者犯了很多錯誤，在決策時不是猶疑不定，就是輕率冒進。從一些戰略要地到最後京城的丟失中，可以明顯看到很多宋朝軍事和政治領導者無法鎮定下來，失去了戰略意識。我們不要只是指責南宋後期領導者無能、自私、愚笨，如果我們承認他們所感受的創傷顯然使他們失去了戰鬥力，那麼對他們的批評就不會那麼尖刻。這種意志或能力的麻痺，正是那些處於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創傷性情境中，人們通常表現出來的精神病症。

其次，創傷的另一個症兆是那些既不能戰又不能逃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暴力與非理性行爲。在南宋的那些忠臣義士中，暴力通常都是往內指向自己的；南宋的傷亡很多是在蒙古兵攻破宋的防線後發生的大規模自殺行爲。當元軍攻破長沙城牆時，李芾（1276 年死）、他的全家以及一些屬下、朋友都自殺身亡，並讓人焚燒他們的屍體，以免受到蒙古人的折磨和羞辱。[14] 當蒙古軍隊將

11 見戴仁柱（Richard L. Daivs），*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110-12。

12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簪要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卷 16，頁 558；或（上海：世界書局本，1935），卷 16，頁 401；參見戴仁柱（Davis），82 的討論。

13 劉敏中：《平宋錄》（四庫全書本）中，頁 4 下-5 上。

14 戴仁柱（Davis），11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退位的南宋皇帝和其他幾百個人押送回北方看守時，在京城的太學生徐應鑣（1276 年死）帶領全家人行了忠於南宋的禮儀之後，一家人有的在家裡自焚而死，有的投井而亡。[15] 這許多的自殺事件與崖山海戰比起來又相形見絀了，20 萬的南宋勤王軍隊，有 10 萬人在這場戰鬥中喪生。當宋的最後一根支柱也在一夕之間倒塌後，尚是孩子的南宋末代皇帝、諸多大臣，以及他們的家人都蹈海而死。[16] 現代學者有時認爲南宋忠臣之所以自殺，只是因爲朝廷敗亡，或是因爲無法做出積極的應對，或只是徒然將悲憤內轉，採取了自殘的方式。然而，如果我們承認這些人是在回應所感受的創傷，那麼我們才有可能對此作出同情的了解。

再次，金和宋的忠臣們留下的那些悲痛文字（下文將作討論），揭示出他們因看到這個世界正被拋入一場大災難之中，而感到的創傷性震動。這種創傷反映了兩個相關層次的「亂」：朝廷之亡帶來的政治動蕩，與更深沈的文化秩序喪失。一直到 1274 年，南宋的士人和官僚看起來還非常自信，認爲蒙古人不能完全征服南宋朝廷；然而，這一年將近年底，京城的官僚們就注意到兩個自然災害，開始擔心即將到來的危機。[17] 京城的一次塌方，和鄰近湖州發生破壞性極大的水患，似乎表明上天一統治權的來源一從南宋奪走了天命。當蒙古軍隊駐紮在京城前的低地上時，太皇太后謝氏（1210-1283）企盼杭州灣的大潮當使從錢塘江來的回流變成洪水，「一洗而空之」。[18] 但是潮汐卻三日不至，所以天和水都拒絕拯救南宋的國運。

懷疑的讀者或許認爲，用心理創傷來解釋這些史實的作法應該打些折扣，因爲人們可以很容易就指出如軍事佔領的暴力性、無能的防禦、以及在宋之前或之後的歷史中，每當朝廷更迭時總有不少的殉國者等事實。在漢人對蒙古入侵的反應中，因朝廷更替而產生的挫敗與沮喪感當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而且，雖然有不少人反對朝廷更替，但也確實有相當多曾仕於金朝和南宋者再仕於蒙古。甚至，絕大多數的宋遺民皆與元朝官僚相友善，還鼓勵自己的兒孫輩仕進新朝。謝慧賢（Jennifer Jay）教授不僅證明了這種最終接受元朝爲正統的

15 戴仁柱（Davis），124-25。

16 特別見謝慧賢（Jennifer W. Jay）的敘述，*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1）, 57-58。

17 見謝慧賢（Jay），203-204 中的討論。

18 陶宗儀：《輟耕錄》（四庫全書本），卷 1，頁 22 上；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本），卷 47，頁 938。參見戴仁柱書的討論，頁 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況，而且也指出關於宋遺民如何堅忍不拔、威武不屈的說法，是怎樣地被誇大。[19]

我的論點與所有劇烈動蕩的時期大概都有關聯，包括暴力式的朝廷更替。然而，我仍然想說，蒙古入侵的持續時間、暴力程度、死傷之眾、攻擊平民的地域規模這幾項，都是史無前例的，就此而言，蒙古入侵對漢人來講，特別是一個重大的心理創傷。因此，看起來除了遭受過如此野蠻殺戮的人數目眾多之外，從未有過的死亡和破壞氣氛的瀰漫，對漢人的影響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不過，有些現代學者表明，中國人反蒙古的偏見直到很久以後，由於對1449 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深感悔恨才產生出來。[20] 當明英宗愚蠢地帶領軍隊越過長城與蒙古人作戰時，明朝喪失了大約 25 萬士兵，蒙古人還俘虜了英宗（1436-49、1457-87 年在位），英宗被扣爲人質幾乎達八年之久。雖然土木堡之變的確深化了中國人對蒙古的仇視，但我懷疑一場主要只對明朝廷和官員們具有重要性的事件本身，能比蒙古入侵中的屠殺平民更有深刻的影響，或更能使人產生創傷感。Allen Young 研究了所謂的「系統發生的記憶」（phylogenetic memory），其中談到重複性的恐懼和痛苦，將創傷根植於神經系統內，它能在「情境重現」時（the moment of reenactment）刺激行動的產生。[21] 以此研究爲基礎，我想表明：如果不存在蒙古入侵時所產生的被壓抑之創傷性記憶，土木堡之變或許並不能激起如此強烈的反應。而且，文化精英也支持這種反應：土木堡之變提供了一個場域，使得苦痛服務於「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s），而不僅僅只爲表達個人之不幸。更進一步來說，除了故意製造的恐怖和殺戮程度之深，蒙古入侵延續了超過三分之二世紀長的時間，毀壞廣度波及中國每一地區。另一個蒙古入侵帶來的震動是，中國第一次全部淪入外族人的手中，這時沒有漢人稱爲天子——即政治文化合法性之中心。而且，儘管元代比以後的朝代言論自由較不受到控制，但很多反對出仕元朝的人

19 謝慧賢（Jay），passim.

20 特別見 Frederic W. 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 in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43-72, 361-69; 陳學霖（Hok-lam Chan）,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 in John D. Langlois, Jr., *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96-97。

21 Young，especially 2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仍都不再直接地批評朝廷，而改用間接的典故來暗示。[22] 如果現存的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前期的作品和明中晚期的著作一樣多的話，或許從 1449 年開始的反蒙古情緒高漲就不會顯得如此突然。況且，元代官員在編修《宋史》時刪除了很多污辱蒙古人的語言，洗淨入侵的記載，使它看起來不是那麼血淋淋的、容易讓人生出創傷感，因此即使有些宋代忠臣義勇被凌遲而死，在他們的傳記中也僅言「不屈而死。」[23]

那些陷於蒙古入侵恐怖感中的人們，其所經歷的政治與文化上的震動，在元好問（1190-1257）的詩中得到了最生動的反映。他的敘事詩是回顧性的構建，爲我們指出了他對朝廷即將結束之際的創傷、動亂感受，以及對他的生活而言是極其重要的文化情感，或許也使我們稍稍瞥見他在此中的精神狀態。元好問早早就在蒙古兵燒毀中都、並在鄉間肆殺劫掠時失去了兄弟和一些朋友，但在 1233 年開封之圍中他親身經歷了生命的脆弱。這個時候，飢餓的人們不得不以死屍來維持生命。[24] 他也被關進皇家的青城，在那裡蒙古人殺死了女真皇室的全部男性，而女性則被押送回北方。在他觀察那吞噬他的毀滅與死亡時，顏色和氣味震動了他的感官，他的一些詩句揭示了這些所見與所聞：「白骨縱橫似亂麻」、「戰地風來草木腥」、「飢烏坐守草間人」。[25] 另一個煩惱是，他認識到「亂」意味著朝廷和社會政治秩序的沒落：

> 老去天公真潰潰，亂來人事轉悠悠。[26]

然而，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上，當那些受到良好文化薰陶的中原年輕男女被趕往北方荒原，遭販賣爲奴隸以換取牲畜時，元好問傳達了他對文化滅亡的感受。例如他寫到：

---

22 如，見 Frederic W. 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 in Arthur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especially 210-11, 224-29。

23 謝慧賢（Jay），71。

24 見劉祁：《歸潛志》卷 11，頁 121-30，及奚如谷（Stephen H. West）, "Chilly Seas and East Flowing Rivers: Yuan Hao-wen's Poems of Death and Disorder, 1233-35, " in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eds.,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281, 284.

25 元好問：《元遺山詩集箋注》，施國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或（台北：世界書局，1958），卷 12，頁 568；卷 8，頁 384；卷 6，頁 308。我從奚如谷教授對元好問詩的分析和注釋中受益不少，對此我向他表示感謝。

26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10，頁 5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卻將沙漠換牛羊。[27]

如此多的人或是被殺，或是被押往北方，這使元好問在他詩歌的圖畫上描繪出一幅「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景象。[28]

帶著爲創傷纏繞的那種無助，元好問使用一個古典譬喻「滄海橫流」，來表達他被動亂的巨浪壓倒的情景：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意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闊劍長槍不信渠。[29]

「滄海橫流」這一喻象最初被用來描寫在西周滅亡之後，孔子對政治和文化混亂的感受。[30] 元好問富有感染力地多次使用這個喻象，極其生動地刻畫出他因無法掌握事件發展之混亂進程，並無法預料它們最後結果而感到的失望和痛苦。外界的動亂已經瀰漫到生活的其它部份。也正如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所表明的，在元好問的詩中，「時間和空間上的脫節也造成了歷史的位移」。[31] 譬如他用六朝之亂這個模糊的喻象，使開封和中原變成東南、黃河變爲長江：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繞城流。願得一身隨水去，直到海底不回頭。[32]

再一次，元好問用比喻的方式提示了一個受創傷者的無助感和自殺念頭。

現在我想在心理創傷這一論題的背景下，探討漢族士人對蒙古入侵的不同回應，先從那些殉國者談起。有些人自殺，如李茀，因爲他們意識到死亡或被俘已經是必然的了；而另一些人，如徐應鑣，選擇自焚，而不在蒙古人進入之前逃離京城，也不願當作戰利品被押送到北方。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這兩個例子都非常著名，部分原因在於李茀和徐應鑣領著全家集體自殺。兩人的

27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6，頁 308。

28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12，頁 568。

29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12，頁 559。

30 范寧用這個喻像來說明文化之亂：「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睹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見〈春秋穀梁傳注疏序〉頁 1 上。

31 奚如谷（West），294。

32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6，頁 3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爲被看成是對朝廷的忠心，但我懷疑他們所經歷的創傷在其中起了促進作用。還有一些人在宋亡之後走上自殺一途，而此時生命和尊嚴都沒有什麼內在的危險。如，士大夫黃震（1213-1280）得病後，他在 1275 年獲准致仕，返回慶元老家，所以他並未親眼目睹第二年京城淪陷的最後一幕。然而，由於他爲宋朝臣子已有十七年之久，黃震情願隱居起來，崖山海戰次年，寡食而死比明節。[33] 謝枋得（死於 1289 年）曾任信州的軍事指揮官，在杭州戰降前不久信州防守就崩潰了，他放棄職守隱居起來。雖然他很快又出來領導義勇軍，但軍隊不久潰散了，他和老母親逃到了一個偏遠的地方。謝枋得顯然已經變得心神錯亂，在集市上哭得不能自已，被人們視爲瘋子。他沒有軍隊可以指揮，朝廷也已敗亡，除此之外，他還失去了家庭：他的家人被蒙古人俘虜後，除他的兩個兒子外，其他人或是被殺，或是自殺，全部死了。最後，兩個兒子在蒙古經過六年的苦役後被釋放，他們找到了謝枋得。往後，他的怨恨逐漸減少，成了一位知名學者。當在元朝爲官的漢人向朝廷推薦他時，他多次拒絕出仕，主要以照顧老母爲藉口。但在母親過世後，他不得不去一趟元朝都城。在路上，他的學生勸他辱罵蒙古人；而且，他們提醒他說，只有一死才能證明他的清白，並在歷史上保住他的清譽。到了大都後，謝枋得先去拜宋皇太后的墓，然後開始絕食，最終餓死。謝枋得的例子相當複雜。儘管他的很多詩詞文章都主張忠於大宋王朝，但他與元朝官員也有往來，甚至還向朝廷推薦過朱熹的一個後裔。[34] 雖然他的死表現了對前朝的忠心耿耿，然而他棄職而逃，以及在大庭廣眾之下痛哭不能自已，還有若干不正常行動，都表明心理創傷至少影響到他最初對蒙古暴虐行爲的反應。

南宋最著名的忠臣、烈士文天祥（1236-1283）的例子，好像給我的論點提出了相當的難題。文天祥最初是一個文官，後被任命爲權兵部侍郎，在朝廷最後幾年掙扎的歲月裡成爲一名活躍的軍事指揮。他曾當面大膽向伯顏要求，在議和之前，蒙古軍隊必須從杭州之圍中撤退；之外，他還因在京城失陷後糾集義勇繼續從事抗蒙大業受到人們的讚揚。[35] 一首令人振奮的〈正氣歌〉使他名垂青史。忽必烈認爲他對南宋的忠臣義士富有號召力，具有潛在的危險，所以

33 《宋史》，卷 438，頁 12991-94；謝慧賢（Jay），181-82。

34 《宋史》，卷 425，頁 12687-90；謝慧賢（Jay），122-29；Mote，232-33。

35 關於文天祥，特別見戴仁柱（Davis）和謝慧賢（Jay）的書，及 Horst Wolfram Huber,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Analecta Husserliana* 21 （1986）: 309-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令將其處死。就在忽必烈下令處死他之前，文天祥寫了這首〈正氣歌〉。這首長詩開篇講到：

>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36]

講完了人是如何稟賦有周流宇宙的正氣，而正氣又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現，文天祥接下去極力贊頌歷代英雄的事跡，最後總結說：「古道照顏色」。他多次企圖激怒蒙古人，想讓他們殺害自己，從而成全他對大宋的一片忠心，這進一步表明了他的勇敢和對自己命運的把握。正如他在 1279 年所寫的：

> 一死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巾幗，男兒嚼齒吞刀鋸。……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平生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37]

他被朝廷派往駐紮在宋京城外的蒙古軍營與伯顏談判時，他聲稱：「刀鋸鼎鑊，非所懼也」。[38] 看起來似乎文天祥不感到任何恐懼，也沒有經歷任何的創傷。 根據他事後對當時情景的回憶，蒙古人相顧動色，稱其爲「丈夫」。的確如此，好像戴仁柱（Richard Davis）教授所下的結論，南方人這種極力想證明自己作爲男人的德行與氣概的念頭，是使這些宋代的忠臣義士們成就英雄行爲並被殺害的主要因素。[39] 戴教授的理解「丈夫」當然不同與《孟子・藤文公下》所謂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主流思想。我本人覺得戴教授的解釋有點過份，所以我從心裡創傷來思考。

我並不想否定文天祥作爲英雄人物的名聲，然而，我還是想探討一下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即，他並非完全沒有受到圍繞他的創傷和混亂所影響。雖然他所寫的以及關於他的文字都描繪了一個英勇的大丈夫形象，牢牢掌握自己

36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4，頁 523，或（世界書局本）卷 14，頁 375。

37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4，頁 488-89，或（世界書局本）卷 14，頁 350。

38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3，頁 440，或（世界書局本）卷 13，頁 315。

39 戴仁柱（Davis），especially 113-15, 134-35, 196-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情感和行爲，但是，有些地方暗示他的精神狀態和情感不是一直都這樣有節制的。就讓我們來思考一下這些地方。謝皇后在 1274 年末下了一份詔書，號召天下士人保衛朝廷。文天祥讀後，因感嘆朝廷處在垂死掙扎的困境而痛哭流涕。[40] 後來，他在詩中寫到鎮江陷落時的大量傷亡：

> 海潮舶千艘，肉食三十萬。江平不肯流，到今有遺恨。[41]

隨後不久，他就作了蒙古人的俘虜，被送往北方。但在押送過程中，他設法擺脫了蒙古人的監視，想逃到南方尋找南宋的殘存軍隊。沿海乘舟而行時，他回想在長江下游地區看到的死屍，寫到：「白骨叢中過一春。」[42] 1279 年，在他再次被俘時，他企圖服毒自殺，但卻沒有死成。然後他被關在一艘參與過崖山海戰的元軍戰船中。在甲板上他目睹了血淋淋的戰爭，以及宋軍崩潰後大量自裁。雖然他在序中提到在觀望戰爭時他痛苦地流淚，但詩中描寫蒙古人戰果的幾句卻相當超然，細緻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其中重要的詩句如：

>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43]

雖然這首詩或許是寫來證明他作爲男子漢的把握與自制，但如此客觀地描述令人心碎的場景，他一定被這一血腥場面所震動，也必定因認識到南宋已失去所有希望而感到震驚。在被當作戰利品運往北方看守過程中，他的逃亡計劃失敗了，然後他再次企圖自殺。這一次他想餓死自己。在他北去的途中，一位朋友爲他寫了祭文，以此來勸他自殺，這樣可以向宋朝表示自己的忠心，也能夠防止由於被迫在蒙古人的朝廷做官而玷污自己的一生清白。[44] 不管文天祥是否看到這些張貼在從贛州至洪州路上顯眼處的悼文，他確實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他計劃在路過家鄉江西廬陵時餓死的打算也落空了。他的朋友在悼文中陳

40 戴仁柱（Davis），62。

41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6，頁 558，或（世界書局本）卷 16，頁 401。

42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3，頁 479。

43 《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14，頁 488，或（四部叢刊本）卷 14，頁 1 下-2 下。

44 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收在《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本）卷 20，頁 711-14，及王的〈吾汶稿〉（四庫全書珍本，第九輯），卷 4，頁 1 上下。參見謝慧賢（Jay），107-109 中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述的爲什麼文天祥應當自殺的原因，當然反映了文天祥自己所想的。[45] 不過，也有可能宋朝軍隊最後被殲滅時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以及他逃亡計劃的失敗，意味了某種程度的創傷，使文天祥感到他無別途可走，只有自殺或在敵人的屠刀下成爲大宋的烈士。

如果文天祥的確在這些場合產生過創傷性情感，那麼他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反諷的是，雖然朋友們勸他自殺，他自己也想結束生命，但假如他在 1279 年自殺成功的話，文天祥作爲英雄人物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吸引人。他決心承受被關在一間陰暗小屋子裡的痛苦，直到蒙古人把他殺害爲止，這以及他的作品——特別是那首〈正氣歌〉——在歷史中提高了他的聲望。考慮到他的詩歌反映了強烈的歷史意識，他對這些可能結局的思考，或許影響到他決定放棄再次自殺的企圖。由於看起來在給後世留下什麼遺產的問題上，他做出如此合乎理性的選擇，那麼他如何克服所感受到的創傷呢？他自己含蓄的答案可能在〈正氣歌〉中找到——呼喚潛在傳統周流宇宙、並使古人做出正義英雄行爲之氣的力量。一方面，對氣的強調植根於傳統文化中，該傳統一直可以上溯到《孟子》「養浩然之氣」章的討論。另一方面，文天祥執著於行動，期望改變宋代士人的文化風貌。如戴仁柱教授所論證的，「當文天祥以健兒形象來清除腐敗的儒士時，他顯然將身體虛弱聯繫到道德的退化——而這種退化，只能由不受當日墮落情景腐蝕的男子氣慨復甦來克服。」[46] 因此，文天祥感受到了一種文化斷裂，這個斷裂表現在宋代的「腐儒」與之前朝代「健兒」之間的分別。他的目標不是想保存宋代士人文化的特別之處及其遺產，而是要激烈地改變這種文化。所以，多少有點令人吃驚的是，南宋最偉大的忠臣超越他所經歷的創傷，是爲了譴責宋代重文輕武的主流文化，激勵人們回到宋以前的那種尚武、自律的文化典範。

當與另一個著名的宋代忠臣鄭思肖（1241-1318）相對照時，文天祥的例子就顯得更加吸引人了。一方面，鄭思肖不僅把文天祥看成宋代忠臣義士的英雄榜樣，而且還期望自己成爲像文天祥一樣活躍的勇士。[47] 鄭思肖做太學上舍生

45 見 Huber, "The Hero and his Culture, " especially 318-21 的討論。 Huber 博士注意到，文天祥放棄自殺並不是意志的脆弱，因為他一直力求追循文學作品中贊頌的為國而死的英雄。但當合適的時間空間失去之後，他顯然覺得有必要改變自己的計劃。

46 戴仁柱（Davis），135。

47 見他的關於文天祥的文章，《鄭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22-29，153-54。特別令人震驚的是，鄭思肖把一個傳言記錄下來，認為是真的，這個傳言說文天祥被殺害後，忽必烈和手下人吃了他的心和肺。Huber 認為：「其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就在 1275 年籲請皇上爲國防投注更多資源；而且，儘管他在蒙古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從來不承認元朝是合法政權。例如，終其一生，他只用宋代年號，而不循元朝頒佈的曆法。他的著作呼喊著：「漢家天子必中興」。[48] 雖說他以文天祥爲忠臣榜樣，但他父親對於忠孝的訓誡，對他的影響卻最深遠。其父鄭震（1199-1262）在南宋做官，也曾遭逢困阨，甚至全家還被囚禁，原因是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宋朝高官的腐化和無能。除了以身作則忠於大宋之外，他還告誡思肖說：「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49] 在另一處，他把標準懸得更高：

> 不能事親，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於家也。……汝不行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50]

思肖的母親加上一句「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這使對不忠不孝的指責更爲嚴重。父親過世後，鄭思肖發現不可能達到這樣高的標準，尤其是無法做到忠孝兩全。母親的告誡——「唯學父爲法」[51] 深化了鄭思肖內心的矛盾。不過，作爲唯一在蘇州照顧病弱母親的人，他選擇寧願在忠的一面虧缺，所以在 1275 年就離開京城逃跑了。因爲有人變節，蘇州城投降了蒙古人。鄭思肖感到深深的挫傷，在詩中寫出了那種無法抉擇的二難：

> 我憶我父教我者，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為命生余生。欲死不得為孝子，欲生不得為忠臣。[52]

思肖的母親於 1277 年過世，他爲母親守喪，沒有加入文天祥領導的軍隊及其他南方的義軍。由於他未能積極參與武裝抗蒙的戰爭，鄭思肖心裡充滿了自責，甚至堅持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的字樣。所以，文天祥通過賦於忠更大的重要性，解決了忠孝之間的兩難；[53] 而鄭思肖卻左右

與其是對噬人者的指責，不如是為了刻畫文天祥富有魅力的人格。由於他的不可戰勝的精神無法被打倒，蒙古人只有訴諸於通過「吃進」他的身體來佔有他的英雄氣概。」（"Hero and His Cultures, "327）。

48 《鄭思肖集》，頁 35。

49 《鄭思肖集》，頁 108。

50 《鄭思肖集》，頁 111。

51 《鄭思肖集》，頁 106。

52 《鄭思肖集》，頁 42。

53 見戴仁柱（Davis），especially 7-11, 129, 169-71 中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搖擺、無法決斷，因此他也不能在文天祥倡導並做到的果斷行爲中，找到個人的意義和成就感。

在另一方面，雖然鄭思肖親眼所見的殺戮、死亡比文天祥目睹的要少得多，他卻見證了比文天祥所感受到更大的創傷。蘇州陷落時，鄭思肖正在城內，但由於蘇州城是自動投降的，所以它沒有遇到像常州及其它城池所發生的大屠殺。雖說鄭思肖對母親有行孝的責任，他還是顯得充滿內疚，因爲孝子的責任大概已經多次用作對未能採取果斷行爲的部分藉口。隨後，他又以自己是獨子來解釋他之所以沒有自殺的原因，而自殺所表現的是對宋朝最後的忠心。但是，他又拒絕娶妻生子來傳宗接代。所以，他沒有作什麼明顯的努力以避免被人稱爲不孝，即沒有生養男性後裔延續鄭家香火。鄭思肖在蒙古入侵中這種沒有任何行動的狀態，反映了烙印在他身上的創傷；而且，那種創傷（或許還伴隨著生活在父母的要求和否認之下的心理壓力）顯然具有長遠的影響，使他既不能以自殺來表示忠心，也不能生養子嗣以示孝順。

鄭思肖把蒙古入侵看成突然的震動。如，在讚揚那些長期爲宋朝任勞任怨的君子豪傑時，他悲嘆說：

> 一自胡兵入，俄驚漢鼎遷。致今人道亂，空谷遁遺賢。[54]

我在那行關於「道」的詩句下加了重點線，是要強調他認識到「亂」對道本身有深刻的作用，所以，某種比朝廷更替還要嚴重的事情發生了。在別處，他同樣抱怨到：「世道忽翻覆，愁來痛徹心」。[55] 而且，鄭思肖所感到的震驚也滲透進夢裡。如，他議論說：

> 鴻雁流離夢亦驚，滿懷淒怨足秋聲。此身不死胡兒手，留與君王取太平。[56]

在他有關宋朝國事的夢中，對亂的感受也使自然世界分崩離析，正如他所寫的：

> 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57]

無論在夢裡，還是醒來，他常常痛苦地低泣。就是在這些哭泣中，他寫下了那

54 《鄭思肖集》，頁 69。
55 《鄭思肖集》，頁 30。
56 《鄭思肖集》，頁 34。
57 《鄭思肖集》，頁 31。在該頁上，另一首詩中有一句也談到天地變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些表達他焦慮和苦痛的詩篇。[58]

當鄭思肖在哭泣時，創傷的影響表現在他的行爲上。當欲哭無淚時，他的痛苦變得更加瘋狂：

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裡身。[59]

甚至他的同時人認爲他很古怪，一些現代學者也當他是表現出最不理性行爲的宋代忠臣。[60] 如，他從來不面向北方站立、坐著或躺臥，因爲那樣可能被解釋爲向元朝皇帝敬拜。無論什麼時候在路上碰巧聽到有人說北部方言，他就會捂上耳朵、大叫跑開。他以畫象徵純潔的蘭和竹聞名，但從來不畫根和土，他想藉此表達他對蒙古人搶佔土地野蠻行徑的憤怒。[61] 他從不賣畫，也不教人學畫，但有時卻送一些畫給那些平民百姓，從他們那裡他絲毫無取。在有生之年，他散盡了大多數財產，還把死後剩下的財產贈給他的佃戶。鄭思肖特別避免與蘇州的菁英接觸或討論，他認爲這些人由於和蒙古朝廷的配合而被玷污。他爲自己不被人們理解的特立獨行感到自豪。

不管在何種程度上，如果鄭思肖想要稍稍超越他所遭受的創傷，他是如何做呢？蒙古入侵之後，據說他根據回憶記錄下在動蕩歲月中所寫的詩歌。重寫這些詩給了他很大的自由，使他能夠自由地重新想像、重新描繪當時的事件，也能夠較自由地處理自己的憤怒和痛苦。他好像有幾個目的，其中三個在這裡比較重要。首先，他力求否認一統天下、控制中國領土就是宣稱元朝具有合法性的充分條件。[62] 第二，他聲稱，承平時期，歷史的修纂歸於朝廷；而動亂之際，修史的職責便有賴於朝廷之外的個人。[63] 第三，在寫作歷史時，運用道德評判的史學方法——揚善懲惡——極其重要，只有這樣，才能爲後人留下富有教育意義的歷史記載。[64] 他編纂了《心史》一書，在 1283 年將手稿封在錫匣

58 《鄭思肖集》，一些例子見頁 23，24，31，32。

59 《鄭思肖集》，頁 24。

60 Mote, 235-36. See also 戴仁柱（Davis），127-29; 謝慧賢（Jay），187-88; Li Chu-tsing, "Cheng Ssu-hsiao," in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Painters*（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6）, 20-21。

61 關於鄭的繪畫，見 Li Chu-tsing, 15-23; Sherman E. Lee and Wai-Kam Ho, *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68）, No.236.

62 《鄭思肖集》，頁 132-37。

63 《鄭思肖集》，頁 196。

64 《鄭思肖集》，頁 15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鐵函裡，悄悄沉於蘇州的一口枯井中。他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心中牢記的就是這幾個要點。自從 1638 年《心史》被人發現之後，它一直激勵著不同時代的民族義士，儘管有些學者認爲它是十七世紀的僞作，懷疑其真實性。[65] 有證據表明鄭思肖晚年趨於平靜，因爲他的後期作品與《心史》相比較多文學性，而較少尖刻激烈。[66] 雖然他年青時專注於儒家著述，在太學時研究朱熹的經注，中年他對道家發生興趣，晚年則轉向禪宗。佛道兩家皆教導萬物相對與即生即滅，所以有可能在鄭思肖回首往事時，這樣的教義教給他一種平和超然的心態。他的超然心態甚至還延伸到對三教的看法，他說到：「今老而死至，悉委之」。[67] 然而，鄭思肖的創傷與不安大概並沒有完全消除——儘管他對宗教教義的研究及其歷史文化著作，爲他的「心狂」提供了某些安慰。

有些人，如元好問，比鄭思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信仰更爲堅定，也比鄭思肖更有基礎超越蒙古入侵留下的創傷。正如上文已經討論過的，元好問的詩刻畫了他不但震驚於血腥的戰爭，而且震驚於當游牧民族在中國文化中心地區燒殺劫掠時文明的喪失。奚如谷教授討論過元好問如何在詩中運用典故，從而將當時的混亂，置入歷史上一治一亂循環不已的傳統觀點之中。如此，元好問就能夠與孔、孟這樣的典範人物產生認同感，這些人也處於亂世，但他們皆以維護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爲己任。因爲文化歷經以前所有混亂的時代卻沒有墜落，所以元好問可能相信通過他自己的努力，歷史文化能夠被保存下來。與他詩中所表現的驚恐絕望不同，在籲請元朝官員如耶律楚材（1189-1243），保護博學之士、保存歷史文獻時，他表達了自己對文化的信心和希望。[68] 元好問自己也立志保存那衰亡朝代的歷史和文化成就。因爲他並沒有受到新政府的差遣，所以他能夠採取非官方立場並忠誠地工作著，就像自稱的「稗官」那樣，收集四處散失的金朝歷史資料，從民間的傳說野語中摘取歷史記憶。元好問編纂了〈中州集〉，希望在中國詩歌傳統中奠立金代詩歌的正統地位。在〈自題

65 《心史》見《鄭思肖集》，頁 1-199。關於這個爭論，見《鄭思肖集》附錄中收集的資料。陳福康在《鄭思肖集》序中論證說，那些認為是偽作者並沒有證實他們的說法，而且認為是偽的必須提出材料，而認為是真的卻不必。謝慧賢（Jennifer Jay）教授說：「衡量雙方論證並讀了〈心史〉之後，我認為其真偽是無法證明的」。（謝慧賢（Jay），76）

66 《鄭思肖集》，頁 203-30。

67 《鄭思肖集》，引在陳福康的序中，頁 3。

68 奚如谷（West），especially 297-302 討論了元好問的歷史意識、使命和貢獻。我很大程度上借鑒了他的討論，但使之用於我自己的問題和論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州集後五首〉中，他聲稱說：

>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無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69]

元好問相信「國亡史興」，他不僅編纂資料，而且還寫了幾部重要著作，爲後人保存了金代歷史。他的弟子在列舉其著述時，描寫了他對歷史和文化的激情：

> 方吾道壞爛，文曜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絕。[70]

元好問所編的史料和所寫的著述，的確最終成了官方編纂金史的重要資料來源，《金史》成爲蒙古人所編三部朝代史中最好的一部。[71] 再者，正如上面這段引文所講的，元好問對文化的使命感不僅提供了一條超越創傷和混亂的途路，而且還使他在「吾道壞爛」時採取建設性的行爲。

總之，除去文天祥、鄭思肖、元好問外，其他許多蒙古入侵的倖存者們看起來都克服了他們的創傷，並通過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心找到了生命意義。有些人多次宣揚：「世喪道不喪」，[72] 著名史學家兼文獻編纂家王應麟（1223-1296），在蒙古統治和暴虐而短命的秦朝之間看出相似之處，從而爲自己找到了信心。因爲文化歷秦朝而不亡，它也一定能夠承受得住蒙古的殘暴。[73] 周密（1239-1298）在收集宋朝的遺物、傳說、和歷史方面非常著名。對某些文化主義者來說，文化使漢人和野蠻的蒙古人截然不同，所以他們以非人的比喻來指稱蒙古人。如，王應麟稱蒙古人爲「蛇豕」。[74] 然而，其他一些文化主義者認

69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 13，頁 611。

70 郝經：《陵川集》（四庫全書珍本），卷 35，頁 2 上-下。

71 陳學霖（Hok-lam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1115-1234）: Three Studi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0）; 及其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72 何夢桂：《潛齋集》（四庫全書本），卷 1，頁 7 上，11 下；轉引自 Yan-shuan Lao, "South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rly Yuan: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 in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132。

73 王應麟：《翁注困學紀聞》（四部備要本）卷 1，頁 6 上下，或《困學紀聞》（孔子文化大全本，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2）卷 1，頁 29-30。見謝慧賢（Jay），177-78 中的討論。

74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四明叢書），卷 5，頁 27 上；謝慧賢（Jay），78, 174-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識到儒家文化傳統中某種潛在的普適性（universalism）。如，建立在人性善這樣的一般論述之上，方鳳（1240-1321）甚至明確聲稱，雖然在文化層次上有不同，但「人性之善，無間夷夏」。[75]大多數現代學者在討論文化主義時，基本上注意到了由於對文化的責任感，使得傳統中國人在文化能夠延續的前提下，比較容易接受長城內外任何民族的統治。換句話說，現代人抨擊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從而批評他們很少抵抗外來的統治。從我們這篇對蒙古入侵的創傷性回應的討論中，我們或許會同意文化主義如何使大批中國人克服心理創傷、轉而態度積極地爲來者保存歷史這個事實的存在，藉以平衡某些學者對傳統文化主義的否定性判斷。總之，這篇針對心理創傷的研究，爲文化在中國的力量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明。

引 用 書 目

（一）中文書目

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萬有文庫薈要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或（上海：世界書局本，1935）。
元好問，《元遺山詩集箋注》，施國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或（台北：世界書局，1958）。
王應麟，《翁注困學紀聞》（四部備要本）。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四明叢書）。
方　鳳，《夷俗考》（寶硯堂筆記）。
宋　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本）。
何夢桂，《潛齋集》（四庫全書本）。
范　寧，〈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3）。
郝　經，《陵川集》（四庫全書珍本）。
脫　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本）。
陶宗儀，《輟耕錄》（四庫全書本）。

75 方鳳：《夷俗考》（寶硯堂筆記），頁 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　祁，《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本）。
劉敏中，《平宋錄》（四庫全書本）。

（二）西文書目

Allsen, Thomas. "The Rise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and Mongolian Rule in North Chin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Barfield, Thomas J.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Cameron, Norma Alexander. "Psychology, Abnormal."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2.

Chan, Hok-lam.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1115-1234）: Three Studi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0.

_____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Davis, Richard L.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Li Chu-tsing. "Cheng Ssu-hsiao." In *Sung Biographies: Painters*,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6.

Ho, Wai-Kam and Sherman E. Lee. *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The Yuan Dynasty（1279-1368）*. 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68.

Huber, Horst Wolfram.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Analecta Husserliana* 21, 1986.

Jay, Jennifer W.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nglois, John D., Jr.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Webster, Inc. 1993.

Lao Yan-shuan. "South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rly Yuan: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J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Mote, Frederick W.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ited by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_____. "Chinese Society under Mongol Rul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ssabi, Morris. "The Reign of Khubilai Kah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hwartz, Vera. "Public Uses of Personal Grief in Modern China." *Daedalus* 125.1 (Winter 1996).

Slater, Lauren. "Repress Yourself."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

Tillman, Hoyt Cleveland and Stephen H. West, eds.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Trosman, Harry "Neurose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2.

West, Stephen H. "Chilly Seas and East Flowing Rivers: Yuan Hao-wen's Poems of Death and Disorder, 1233-35." In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Stephen H. Wes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Wright, Arthur,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Young, Allen. "Suffering and the Origins of Traumatic Memory." *Daedalus* 125.1 (Winter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